

# 东方文化联盟中印度成员的活动

——以鲍斯和萨海为中心——

劉 重 越

## Activities of Indian Members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League ——Focus on Rash Behari Bose and Anand Mohan Sahay——

LIU Chongyue

As an Asianism group with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iderable influences, the Oriental Cultural League focused on the Japan-India relations and Japan-India Trade, and attracted many Indian independence activists (swarajists) in Japan, including Rash Behari Bose (1886-1945, ラス・ビハリ・ボース) and Anand Mohan Sahay (1898-1991, アナンド・モーハン・サハイ).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ir activities, so as to buil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y the Oriental Cultural League attaches so much importance to the Japan-India relations and Japan-India Trade.

キーワード：アジア主義 (Asianism)、東方文化聯盟 (the Oriental Culture League)、日印関係 (Japan-India relations)、ラス・ビハリ・ボース (Rash Behari Bose)、アナンド・モーハン・サハイ (Anand Mohan Sahay)

## 前言

自1880（明治13）年兴亚会始，短短几十年间，亚洲主义在日本生根发芽，涌现出繁多的团体和个人，亚洲主义思想也可谓五花八门，正如竹内好所说，“每个亚洲主义者的亚洲主义思想都是不一样的”。单就团体而言，兴亚会、东亚同文会、玄洋社和大亚细亚协会等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及研究价值，战后对这些团体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即便时至今日也不断有全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不过在这些知名的团体之外，还存在着很多并不那么知名亦或是体量及活动范围有限的亚洲主义团体，本文所涉及的东方文化联盟正是其中的一个。这些团体或许并没有如上述那些团体般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果对具有特色的团体进行深入研究，也可以对亚洲主义研究领域带来有力的助益，而东方文化联盟正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亚洲主义团体。

东方文化联盟（除着重说明外，一般略称“联盟”）是由清水银藏（1879-1937）牵头组织，1931（昭和6）年12月10日在大阪俱乐部<sup>1)</sup>成立的以日本关西地区为核心活动区域的民间亚洲主义团体。其宗旨是“同情印度反英斗争和中国统一运动，加强亚洲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亲和团结，进而实现人种平等和共存共荣”。<sup>2)</sup>联盟主要由关西地区的工商界和新闻界人士组成，并辅以少量的政治家、学者和外国人士。重要成员有清水银藏、内藤湖南、佐多爱彦、户田芳助、拉希·比哈里·鲍斯（ラス・ビハリ・ボース，Rash Behari Bose）和殷汝耕等。发行有机刊物《东方文化联盟会志》（『東方文化聯盟会誌』）。<sup>3)</sup>

联盟的特点有三：

一是成立时间点。近代日本亚洲主义兴起于1880年兴亚会成立，而知名的亚洲主义团体多成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玄洋社（1881，明治14）、东亚同文会（1898，明治31）和黑龙会（玄洋社分支，1901，明治34）等。彼时亚洲主义刚刚兴起且日本国内环境较好，亚洲主义的发展十分迅猛，大多数亚洲主义团体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不过到了1930年代，随着“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的接连发生，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情绪高涨，右翼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军部逐渐取代政府掌控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在这种大背景下，新晋成立的亚洲

1) 位于大阪市中央区今桥4-4-11的大阪俱乐部作为会员制的社交俱乐部，1912（大正元）年由大阪的财经界人士创立。迄今已被持续利用百年以上。作为大阪三大名建筑之一（另两处为棉业会馆和大阪煤气大厦），1997年被指定为有形文化财。

2) “东方文化联盟之宗旨”出现在每号《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的扉页上。

3) 《東方文化聯盟会誌》共十九号，为半年刊，刊行时间从1932（昭和7）年至1941（昭和16）年。其中前两号名为《東方文化聯盟会報》，从第三号开始改称《東方文化聯盟会誌》。现一般将全部十九号通称为《東方文化聯盟会誌》。

主义团体多是右翼或极右翼团体，如松井石根创立的大亚细亚协会（1933，昭和8）。东方文化联盟作为一个从创立之初就奉行早期亚洲主义思想，主张和平，坚决反战的左翼亚洲主义团体，在1930年代的日本国内环境下无疑是一种独树一帜的存在。

二是成员的构成。常见的亚洲主义团体多由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及学者组成，而联盟则另辟蹊径，以工商业者和新闻界人士为骨干力量，如岩井胜次郎、栗本勇之助、神尾茂和平川清风等。联盟如此的成员构成在亚洲主义团体中即便不是独一无二，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三是注重日印关系。亚洲主义诞生的初衷是联合亚洲各国共同对抗欧美，虽说是亚洲各国，其实主要联结对象是东亚的邻国中国和朝鲜。因此绝大部分的亚洲主义团体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中国，这一点在1910年“日韩合并”后更加突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去关注其他的国家，如玄洋社的头山满就对东南亚和南亚的独立运动人士尤为关注，并多有援助。不过就团体层面而言，将日印关系拔高到和日中关系并驾齐驱程度的团体只有东方文化联盟一个。

联盟重点关注日印关系的原因有二：

一是开拓海外市场。日本外务省的对外文化事业在日中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之前，虽然名为“对外文化事业”，但其基本上只是所谓的“对支文化事业”，即主要针对中国。印度、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并未被纳入到当时的对外文化事业的体系当中。<sup>4)</sup>1920年代，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体系中，仅中国和美国就占据了60%左右的份额，显示出极度的不平衡。但是随着1919（大正8）年5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1924（大正13）年4月美国出台“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sup>5)</sup>，日本与中美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对外贸易过于单一的弊端逐渐显现，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日本对外贸易额开始不断萎缩。在主要海外市场受到民族主义夹击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下，1924年币原喜重郎担任外务大臣之后，开始推行“经济外交”（币原外交），大力提倡对外贸易多元化，积极开拓南洋（印度）和中东（埃及）等地区的市场。<sup>6)</sup>而新市场的开拓正好符合关西地区工商界人士的利益，因为历来以轻工业为主的关西地区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以重工业为主、且工业体系更加完备的关东地区。

而关西地区的工商业者是联盟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大阪为最。按照铃木茂三郎的记述，当时大阪“大部分公司的课长（部门主管）都是联盟的成员”。<sup>7)</sup>虽然目前联盟仅有理事和评议员名

4) 三谷隆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外務省文化事業に就て”（《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号、1940年）、38-49页。

5) 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案”（Johnson Reed Act），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限制了年度的移民人数，并按国籍设立移民配额，二是禁止亚洲人移民美国。该法案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排日移民法”。

6) 佐古丞“大正期經濟外交の視点——国家像の再构筑”（《大正再考——希望と不安の時代》、ミネルバァ书房、2007年）。

7) 铃木茂三郎《財界人物評論》（改造社、1936年）、252-259页。

单留存于世，并无成员的具体名单，但是由于《财界人物评论》出版于1936（昭和11）年，正值联盟活动的巅峰期，因此铃木氏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二是联盟中印度成员的影响。联盟成员中，一直有少量外国成员，其中以中国人和印度人为主。中国人有殷汝耕（政治家）、杨寿彭（旅日商人、国民党神户支部支部长）、戴克谔（中国银行大阪支行行长）等，印度方面则主要是拉希·比哈里·鲍斯（日籍印裔独立运动家）及阿南德·莫罕·萨海（旅日独立运动家，アナンド・モーハン・サハイ，Anand Mohan Sahay）。

综上所述，由于东方文化联盟所具有的特点，虽然其并非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亚洲主义团体，但是其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从亚洲主义研究的角度来说，虽然联盟的亚洲主义思想并不新奇，但是它的所处时间段、成员构成和注重日印关系都使它成为一个很好的范本，可以极大地丰富亚洲主义团体研究的多样性。特别是以关西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亚洲主义团体并不多，针对联盟的研究可以填补关西地区亚洲主义史的研究空白。从日中交涉史的角度来说，联盟是一个在两国关系趋紧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的1930年代前期仍然坚持奉行对中友好，和平反战的团体，也是一个在1934（昭和9）年仍然愿意主动和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交流，推动睦邻友好的团体。<sup>8)</sup>中国学界很多学者对1930年代的日本抱有一种偏见，那就是日本社会上下都充满狂热的情绪，主张对外侵略。而对联盟的研究正可以说明那时的日本并非“铁板一块”，在民间仍然有不少主张反战和平的声音，也有不少人在为着和平的理想而奔走呼吁。

由于知名度并不算高，再加上一手资料匮乏，学界关于东方文化联盟的研究一直不多。作为相关研究的先驱之一，笔者的导师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著有论文“内藤湖南和东方文化联盟——昭和初期亚洲主义的一种形态<sup>9)</sup>”和“内藤湖南晚年的东方回归及其含意：从《新支那论》到东方文化联盟<sup>10)</sup>”。陶氏这两篇论文以联盟的核心之一内藤湖南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内藤湖南亚洲主义思想对联盟的作用及联盟成立的始末。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东方文化联盟研究中最为核心的先行研究，不过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那就是着重于内藤湖南和联盟成立前后，并未过多涉及联盟中后期和其他成员。大阪大学瀧口刚教授近年的新作“东方文化联盟——一九三〇年代大阪的亚洲主义<sup>11)</sup>”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瀧口氏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

8) 关于联盟的日中关系非本文所论述的重点，详见笔者论文“大阪アジア主義の理想と現実——1934年清水銀藏の中国旅行を中心に”（《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5号预刊、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22年）。

9) 陶德民“内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3、2008年）。

10) 陶德民“内藤湖南晚年的东方回归及其含意：从《新支那论》到东方文化联盟”（《台北中央研究院“视域交会中的儒学：近代的发展”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2013年）。

11) 瀧口剛“東方文化連盟——一九三〇年代大阪のアジア主義”（《阪大法学》、卷69、第3・4号、2019年）、487-520页。

193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联盟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大亚洲主义团体。除上述两位知名学者外，笔者也公开刊行有论文“东方文化联盟成立的背景和过程”<sup>12)</sup>和“1930年代日本亚洲主义中的人种平等问题：以关西地区的东方文化联盟为例”<sup>13)</sup>。前文以陶氏论文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联盟成立的背景和始末，后文则以联盟中的印度成员鲍斯为切入点，探讨了联盟对于亚洲人种平等问题的关注情况。

除研究论文外，还有部分著作中提及到了联盟，除前述铃木茂三郎的《财界人物评论》外，高梨光司著有《佐多爱彦先生传》<sup>14)</sup>，此书是联盟创始人之一佐多爱彦的个人传记，其中有单独的章节论述佐多在联盟中的活动情况。青江舜二郎著有《亚洲人·内藤湖南》<sup>15)</sup>和《龙的星座——内藤湖南的亚洲生涯》<sup>16)</sup>，青江氏在书中提及联盟是在外务省的授意下成立的，此论被陶氏在其论文中予以了反驳。和本文关系最大的要数中岛岳志所著的《中村屋的鲍斯——印度独立运动和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sup>17)</sup>及鲍斯的女儿樋口哲子所著的回忆录《父亲鲍斯——追忆中的亚洲和日本》<sup>18)</sup>，这两本著作皆为印度独立运动家鲍斯的个人传记，详细记述了其的一生及在日本从事印度独立运动事业的情况。

本文拟以东方文化联盟的机关刊物《东方文化联盟会志》（除着重说明外，一般略称“《会志》”）为基础，以联盟的重要印度裔成员鲍斯和萨海为中心，探讨联盟内部印度裔成员的活动情况。本文与前述笔者的论文“1930年代日本亚洲主义中的人种平等问题：以关西地区的东方文化联盟为例”相辅相成，探讨联盟为何会如此地看重日印关系。

## 1 联盟中印度成员的基本情况

东方文化联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的亚洲主义团体，但其成员却不仅限于关西地区，有不少成员都来自日本全国各地，亦有不少外国成员加入。截止1936（昭和11）年，联盟正式成员875人中，有外国成员56人，分别为中华民国36人（内含学生20人）、印度10人、苏联5人、满洲国4人、暹罗（泰国）1人。<sup>19)</sup>由此可见，刨除学生，中国人士和印度人士的数量相差并不多，

12) 劉重越“东方文化联盟成立的背景和过程”（《文化交渉：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第9号、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9年）、163-179页。

13) 劉重越“1930年代日本亚洲主义中的人种平等问题：以关西地区的东方文化联盟为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4号、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21年）、481-492页。

14) 高梨光司《佐多愛彦先生伝》（佐多愛彦先生古稀寿祝賀記念事業会、1940年）。

15) 青江舜二郎《アジアびと・内藤湖南》（时事通信社、1971年）。

16) 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生涯》（中公文庫、1980年）。

17) 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白水社、2005年）。

18) 樋口哲子《父ボース——追憶のなかのアジアと日本》（白水社、2005年）。

19) 清水銀蔵“創立五週年を迎ふるに當りて”（《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九号、1937年）、6页。

这也可以说明联盟对日印关系的重视。

不过由于联盟仅有理事和评议员名单存世，具体成员名单早已佚失，因此仅能从《会志》的记载中掌握部分成员的名字。

联盟成员分成理事、评议员、正式会员和非正式会友（非正式成员）等四个等级。

联盟理事历任者共 15 人，皆为日本人，如清水银藏、内藤湖南、佐多爱彦等，无外国人士。

联盟评议员历任者共 200 人左右，其中有印度 2 人、中国 2 人，分别是拉希·比哈里·鲍斯（1886-1945，以下略称“鲍斯”）、阿南德·莫罕·萨海（1898-1991，以下略称“萨海”）、杨寿彭和戴克诣。其中，鲍斯和萨海两人从始至终担任联盟的评议员之职（《会志》第一至十九号），杨寿彭（《会志》第一至十三号）和戴克诣（《会志》第九至第十九号）则只是阶段性担任评议员的职务。可见，从评议员的角度而言，印度成员的存在感要略大于中国成员。

除了鲍斯和萨海之外，确定为联盟成员的印度裔人士还有以下几位：

卡帕利阿佐普拉吉（カパリアゾブラジ、英文名不详）。联盟创立者之一清水银藏曾在《会志》第一号上刊载有文章“东方文化联盟成立的经过”<sup>20)</sup>，此文详细叙述了联盟成立的始末。其中提及 1931（昭和 6）年 4 月 28 日举行的“关于东洋问题的恳谈会”（東洋問題に関する懇談会，联盟的成立筹备会议之一）与会者（28 人）和 7 月 9 日确定的联盟发起人名单（92 人）中都包含有三位印度裔人士，其中就有卡帕利阿佐普拉吉的名字（另两位是鲍斯和萨海）。可见卡帕利阿佐普拉吉和鲍斯、萨海一样都是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卡普尔（デー・エヌ・ Kapoor、D·N·Kapoor），旅日实业家。卡普尔并非联盟的发起人和评议员，不过其参加过多次联盟的重要活动。1933（昭和 8）年 1 月 16 日讨论“日印通商条约”废弃问题的紧急理事会、1933 年 4 月 22 日在大阪朝日会馆举行的日印问题演讲会、1933 年 6 月 7 日印度实业家希雅玛鲁达斯（サア・ラルバイ・シヤマルダス）欢迎演讲会和 1933 年 10 月 9 日的演讲午餐会等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在 1933 年 4 月 22 日的日印问题演讲会上，卡普尔还作为印度的代表之一（另一人为萨海），进行了名为“日印贸易的将来”（日印貿易の将来）的主题演讲。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阿亚潘·皮莱·马德哈万·奈尔（1905-1990，アイヤッパン・ピッライ・マードヴァン・ナーヤル，Ayappan Pillai Madhavan Nair），他是联盟中除鲍斯和萨海外，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旅日印度独立运动者。1928（昭和 3）年奈尔受在北海道大学读书的兄长的影响赴日留学，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在校期间结识了鲍斯，并开始关注印度独立运动。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栗本铁工所（联盟理事栗本勇之助创办的企业）工作，并开始作

20) 清水銀藏“東方文化聯盟設立に至るまでの経過”（《東方文化聯盟會報》第一号、1932年）、1-10 頁。

为印度独立运动家从事公开演讲等活动。<sup>21)</sup>后为专心从事印度独立运动，从栗本铁工所辞职，前往东京成为鲍斯的心腹之一。他和鲍斯一样长居东京，因此在联盟中的活动并不是十分频繁，如其参加了1933年4月21日大阪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有吉明的午餐演讲会等活动。

除上述三人可以确定为联盟的正式印度成员外，实际上在联盟活动中还出现了不少印度人的身影，如卡卢瓦（カルワー）、丘泰（ブイデイ・チョウタイ）和伊索麦鲁（エム・イソマイル）等人。不过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且联盟的活动多为组织亲善活动或邀请非联盟成员进行演讲讨论会，参与联盟活动者有不少并非联盟的成员，因此只能确定他们参与了联盟的活动，无法断定他们是否为联盟的正式成员。

## 2 鲍斯的活动情况

1886（明治19）年5月25日，鲍斯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苏巴尔达哈村（Subaldaha），父亲比诺德·比哈里·鲍斯（Binod Behari Bose）是当时英国殖民政府负责新闻报道的秘书。鲍斯的早年教育来自其祖父卡里查兰·鲍斯（Kalicharan Bose），并养成了固执和愤世嫉俗的性格。在跟随父亲离开苏巴尔达哈后，先后就读于金德讷格尔（Chandannagar）的迪普莱学院（Dupleix College）和加尔各答的莫顿学校（Morton school），并曾前往法国和德国留学，获得了医学和工程学的学位。

留学归来后，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北阿坎德邦首府德拉敦（Dehra Doon）的森林研究所任职。不过，鲍斯并不甘于一直待在偏僻的研究所工作，此后他和当时印度很多上层的子女一样都参与到印度的独立运动当中，并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鲍斯的革命思想可以追溯到就读于迪普莱学院期间，时任校长查鲁·钱德拉·罗伊（Charu Chandra Roy）激励鲍斯加入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革命运动。此外，印度教圣哲室利·阿罗频多·戈斯（Sri Aurobindo Ghose）对鲍斯的革命思想也有很深的影响。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鲍斯除了参与对时任总督的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男爵的未遂暗杀，1915（大正4）年2月还策划了拉合尔地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鲍斯作为首谋者被英国殖民政府通缉，并悬赏一万两千卢比。鲍斯因此被迫离开印度，并于同年6月抵达日本。

在抵达日本后，鲍斯很快就结识了很多的亚洲主义者，其中包括孙中山、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和大川周明等。由于当时日英同盟的存在，英国要求日本政府驱逐鲍斯，在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的努力奔走和呼吁下，日本政府最终撤回了对鲍斯的驱逐令。1918（大正7）年鲍斯和

---

21) 河合伸訳《知られざるインド独立闘争—A・M・ナイル回想録（新版）》（風涛社、2008年）。

东京新宿中村屋老板相马爱藏的女儿俊子结婚，1923（大正12）年正式入籍日本。

在日期间，鲍斯与萨海、奈尔等人一起说服日本当局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者，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42（昭和17）年3月28日至30日，鲍斯在东京召开会议，成立“印度独立联盟”，着手组建“印度国民军”。次年7月4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会议上，将印度独立联盟主席和印度国民军司令职务移交给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自己转任名誉主席。同年10月，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于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11月5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1945（昭和20）年1月21日因病去世，去世后被日本政府授予二等旭日重光章。

由鲍斯生平可见，他长期在东京活动，那他又是如何和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呢？在前述文章“东方文化联盟成立的经过”中详细记载鲍斯参与联盟成立活动的全过程。

六月四日（中略）由神戸的萨海氏介绍，前往稳田（现东京都涩谷区——笔者注）拜访印度革命志士鲍斯。<sup>22)</sup>

此处的6月4日指的是1930（昭和5）年，即联盟开始筹建的第一年。通过内容可知清水银藏在萨海的引荐下，以鲍斯会面。

到了1931（昭和6）年，即联盟筹建的第二年，鲍斯更多地参与到联盟的筹建活动当中。4月8日，参加了前述的“关于东洋问题的恳谈会”。5月28日，清水拜访鲍斯，邀请他前往大阪进行演讲。7月9日，发布了联盟发起人名单，鲍斯位列其中。11月23日，清水拜访鲍斯，邀请他参加联盟的成立式。12月10日，鲍斯参加在大阪俱乐部举行的联盟成立式，还在会上做了名为“文明之母亚细亚”的演讲。

以上就是鲍斯参与联盟筹建的相关活动。除了没有参加1931年11月8日成立的“联盟创立委员会”外，鲍斯作为联盟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几乎所有联盟筹建过程中的重要活动。

在联盟成立之后，由于鲍斯长居东京，他参与联盟活动并不频繁，联盟在关西地区组织的活动几乎都不见他的身影。他参与联盟的活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到大阪进行演讲讨论会，如1934年11月10日千家尊建（出云大社千家子嗣）、福田宏一和户田芳助（联盟事务所干事）三人在大阪中央公会堂大洋轩组织的鲍斯来大阪欢迎会等。二是在《会志》上发表文章。

接下来，笔者将以鲍斯在《会志》中发表的文章为切入点，来探究其在联盟中的具体活动情况。

---

22) 同注20)、3页。



鲍斯在《会志》中仅发表过四篇文章，且全部集中在1932-1934年，分别是“文明之母亚细亚”<sup>23)</sup>、“殖民帝国的苦闷”<sup>24)</sup>、“东洋的国家主义和西洋的国家主义”<sup>25)</sup>以及“有色人种的崛起和白色人种的衰微”<sup>26)</sup>。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在此以“殖民帝国的苦闷”为例，对鲍斯和联盟之间关系，及在联盟中的活动进行说明。

“殖民帝国的苦闷”刊载于《会志》第二号，鲍斯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新印度宪法案”、“国际联盟”和“日印通商条约”三个方面叙述了印度的困苦。

英国发布了新印度宪法案的详细内容，军事、外交、财政等重要部门仍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中略）英国政府的权力还和以前一样，帝国主义的榨取依然在继续进行。这也就难怪印度人民会抗拒这部宪法了。如果英国真的对印度抱有诚意，那就无条件释放以甘地为首的数千名囚犯，并承认印度完全独立。

鲍斯所说的“新印度宪法案”是指1933（昭和8）年3月英国公布的“印度政府法案”草案，这一法案推行的全印联邦制和省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独立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并没有触及殖民统治的根基，因此遭到印度各大进步党派的强烈抵制，而鲍斯所在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正是其中抵制最激烈的一个。

国际联盟不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而是为了保护殖民帝国的利益。日本在退出国联之后，受到了全亚洲的感谢。虽然日本失去了国联中欧美国的好意，但是却得到了数亿有色人种真正的友谊。日本国策的一大变化是放弃了和列强之间的绝对妥协主义，转而指导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这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的胸襟。

对鲍斯来说，日本无疑是他的第二家乡。当他被迫从印度出走时，是日本给了他继续从事印度独立运动的机会。因此，鲍斯在退出国联等事上给日本背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而1930年代前期日本觊觎东南亚和南亚的野心尚未暴露，因此此时鲍斯为日本对印度的援助唱赞歌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必须看到，到了1942年“大东亚会议”时，鲍斯作为印度独立联盟的名誉主

23) 拉希·比哈里·鲍斯“文明之母亚细亚”（《东方文化联盟会报》第一号、1932年）、11-28页。

24) 拉希·比哈里·鲍斯“殖民帝国的苦闷”（《东方文化联盟会报》第二号、1933年）、59-61页。

25) 拉希·比哈里·鲍斯“东洋的国家主义和西洋的国家主义”（《东方文化联盟会志》第四号、1934年）、26-42页。

26) 拉希·比哈里·鲍斯“有色人种的崛起与人种的衰微”（《东方文化联盟会志》第五号、1934年）、101-104页。

席，在日本承诺不把印度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情况下，才勉强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可见，那时的鲍斯早已经看清日本的野心，不过已骑虎难下。<sup>27)</sup>

反倾销法案通过后，日印通商条约就被废止了。此举从根本上是为了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中略)日本是除了英国外，印度唯一的纺织物供给国。如果日本的产品被驱逐，那印度人民只得购买昂贵的兰开夏郡纺织品，<sup>28)</sup>而这也对印度国民大会领导的抵制英货运动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就新法案而言，日本和印度是苦闷的，英国是得利的。(中略)今日印度的经济依然受到英国的支配，相对印度的利益，英国更加重视本国的利益，因而采取牺牲印度，保护英国商人的政策。如果印度获得独立，印度人可以支配印度的经济，那对日本和印度不利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那对日本人来说印度的自由有何意义就很明显了。因此，作为日本人对印度解放运动施以援手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上一段鲍斯就国联问题对日本的赞扬略显虚无缥缈，那这一段话就提到了实质性的问题——日印通商条约的废除。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在近代称为“天下的厨房”(天下の台所，意即经济中心)，虽然工业体系不如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完备，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轻工业，更进一步地说即是纺织业。由此可见，英国对日本的反倾销法案对大阪纺织业在印度的市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联盟的核心力量一直都来源于大阪的工商界，其中不乏纺织业人士的身影，如岩井胜次郎(理事)是大阪贸易协会会长；庄司乙吉(评议员、理事)是东洋纺织会社社长、大日本纺织联合会会长；阿部房次郎(评议员)是大日本纺织联合会会长；藤井善助(评议员)参与创立大阪金巾制织、山阳纺织。此外，在联盟成员中还有大量从事纺织贸易活动的中下层商人。因此虽然联盟是一个以从事文化活动为主的亚洲主义团体，但其实质的目的是通过亚洲主义的文化活动为贸易开路，借以开拓海外的市场。

由此可以推断，日印的贸易纷争是日英两国间的痛点，也是鲍斯参与到联盟活动中的第一大诱因。鲍斯以东京为根据地，长年从事印度独立运动，拥有广泛的人脉，如和头山满等玄洋社成员关系十分密切。在联盟成立之前，他就经常前往关西地区活动，和以神户为活动中心的萨海联系频繁。<sup>29)</sup>不过，由于当时关西地区并没有合适的团体可供合作，因此鲍斯多是以个人身份从事活动。当清水银藏通过萨海联系到鲍斯，希望他可以加入到东方文化联盟的创建中时，这无疑正中

27) 深田祐介《黎明の世紀 大東亜会議とその主役たち》(文藝春秋、1991年)。

28) 兰开夏郡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英国亚麻、毛和棉纺织工业的中心。

29) 当时神户是日本最大的印度裔聚居地，萨海在当地印度裔社区拥有很高的声望。

鲍斯的下怀。联盟作为关西地区规模最大的亚洲主义团体<sup>30)</sup>，且成员多为社会名流，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名望，这对鲍斯在关西地区扩大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力拥有极大地助益。大阪的工商界之所以选择吸纳鲍斯加入，究其原因和印度的市场脱离不了干系。大阪工商界在面对“日印通商条约”的废除问题及反倾销法案时，无力直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印政策<sup>31)</sup>，唯有寄希望于采取怀柔的亚洲主义文化活动和援助印度独立运动者的双管齐下的办法来保住印度的市场。<sup>32)</sup>而在日本活动的印度独立运动者中，鲍斯无疑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位。因此，在两边都有求于对方的情况下，可以说合作一事是一拍即合。

综上所述，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和亚洲主义团体而言，中国一直都是亚洲主义思想输出的主要对象国。而东方文化联盟另辟蹊径，将视点转向位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这并非慧眼独具，而是基于现实的经济贸易。虽然联盟是借亚洲主义文化活动来扩大自己的海外市场，但是这不能否认联盟在反战、反殖民上所做出的努力。而鲍斯参与东方文化联盟的创建及之后的活动，相当程度上也是基于现实利益的关联，不过两者在反战、反殖民上确实也拥有共识。鲍斯在联盟中的着眼点主要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如日印关系、日印贸易和反殖民斗争等，虽然由于其长期居于东京，在联盟中的活动频率并不高，但可以确定的是，鲍斯无疑是让联盟了解印度问题的领路人，在联盟对印度的关注上，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说鲍斯是所有外国成员中对联盟影响最大的角色也毫不为过。

### 3 萨海的活动情况

萨海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巴加尔波雷(Bhagalpore)的一个中产家庭。1920(大正9)年进入帕特纳大学(Patna University)学习医学，1923(大正12)年辍学，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决定去美国留学，然后返回印度从事独立活动。然而，比哈尔邦当局拒绝向他发放前往美国的护照，因此萨海决定先去日本，试图从日本的英国领事处获得有效的旅行证件。抵达神户后，萨海发现尽管神户是印度人在日本的主要聚集地，但这些印度人(主要是商人)因为担心失去护照，因此对印度政治不感兴趣。而萨海也没有在日本得到他想要的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他没有选择返回印度，而是决定留在日本，他相信他在日本可以促进印度独立事业和印日友好。1924(大正

---

30) 初始成员 92 人，巅峰期拥有正式及非正式会员 1000-1100 人。作为对比，同样关注印度独立运动的玄洋社，巅峰期仅有成员 500 余人。

31) 关于“日印通商条约”和反倾销法案的讨论旷日持久，贯穿 1920 年代后半期和 1930 年代前半期，“日印通商条约”直至 1936 年 10 月 21 日才正式废除。

32) 东方文化联盟从创立之初就认为亚洲主义应该远离政治，因此其政治性一直很弱，成员中也少有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关于联盟的政治性问题，详见佐多愛彦“文化的親善運動の意義”(《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十号，1937 年)、14-21 页。

13)年,萨海在神户自行组织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日本支部,并任支部长。起初,萨海在神户基督教青年会教授英语,在那里他不仅有机会与居住在日本的印度学生和年轻商人见面,还有机会与日本年轻会面,萨海渴望能够影响他们。

然而,在1920年代,由于《英日条约》仍然有效,日本报纸不接受公众直接攻击英国,因此想要在日本宣传印度独立事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此外,日本人对其它亚洲民族的独立运动似乎并不热心。针对后者,萨海开始尝试在日本媒体上为甘地、尼赫鲁和拉金德拉·普拉萨德等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撰写简短的传记。

与此同时,萨海自称是亚洲革命的秘密特工,并用一个站不住脚的掩护,一家名为“国际贸易商”的进出口公司,来维持这种特殊的自我形象。1927(昭和2)年萨海以国际贸易商的旅行推销员身份重返印度,在印期间,与尼赫鲁、钱德拉·鲍斯等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会晤,并被授意在日本进行印度独立运动。1929(昭和4)年1月,萨海向印度报纸寄送了关于介绍印度国民大会日本支部的文章。3月15日,萨海写信给印度国民大会,询问是否正式承认日本支部。5月8日,尼赫鲁以支部成员必须缴纳100卢比的会费为要求,正式承认日本支部。

在随后的几年中,萨海先后创建了印度旅馆(神户、1932年)、关西印日协会(大阪、1933年)、印日青年协会(1934年)、京都—印度—日本协会(京都、1934年)、日印同志会(大阪、1938年)和印度旅馆(大阪、1938年)等组织。此外,1930(昭和5)年他还在神户出版了一本英文刊物《印度之声》(Voice of India),该刊以半月刊的形式发行。从第二卷开始,《印度之声》改成一半英文,一半日文。书中内容基本都是他的活动、演讲和意见,显然《印度之声》从一开始就是萨海的个人工具。然而,对于驻日英国外交官来说,《印度之声》只不过是一种反英宣传。

萨海作为常年植根于神户的印度独立运动者,认为印度民族主义似乎对日本最大的神户印度人社区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在他自己心目中,他认为当地的印度同胞一般是非政治性的,因为他们担心护照可能会被英国当局没收。他们的生计都依靠他们的企业,主要是纺织品,因此他们非常不愿意引起对他们任何其他非商业方面过分的关注。萨海本人清楚地了解散居国外的印度社区的性质,正如前文所说,他本人还打着商人的幌子。

1943(昭和18)年“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成立后,萨海担任钱德拉·鲍斯政府的部长。在日本投降前夕,萨海和其他政府高官被安排从新加坡飞往日本。然而,萨海在越南河内被英军逮捕,并送回新加坡。在尼赫鲁等人的努力下,1946(昭和21)年3月30日,萨海被无条件释放。印度独立后,曾担任驻毛里求斯高级专员等外交职务。1991年去世,享年93岁。

不同于鲍斯的是,萨海长居于神户,离大阪很近,因此他参与了许多联盟的活动。萨海参与联盟活动的方式和鲍斯大同小异,即参与联盟组织的现场活动和在《会志》上发表文章。《会志》

除第一号和第十号外，其余十七号都在最后附有“会务记事”一栏，主要内容为记录自上一次《会志》出版以来联盟的各项活动详情。会务记事中不仅每一项活动都精确到年月日，而且大部分活动都附有出席者名单，已是颇为详细。可以说是研究联盟活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资料，本文中提及的所有联盟活动都来自于此。

在联盟的活跃期（1932-1937），一年平均举行 12 次左右的活动，后期（1938-1941）则为 6-10 次。萨海作为联盟评议员，参与了其中大部分的活动。如 1933 年联盟共举行除理事会外的现场活动 12 次，萨海参加 8 次。1934 年联盟共举行除理事会外的现场活动 10 次，萨海参加 7 次。由于数据繁多，笔者在此不再列举。通过《会志》的“会务记事”可以看出，萨海基本上参加了联盟三分之二以上的现场活动，甚至部分活动是由他组织的，如 1933（昭和 8）年 1 月 16 日萨海邀请部分联盟评议员参加日印关系讨论会，并在会上引荐了赴日进行表演的印度弓术名家卡尼瓦利（カニワリ）。2 月 11 日卡尼瓦利在大阪进行了公开弓术表演，观看者超过 4000 人。此外，他还以非理事的身份参加了部分联盟理事会议，如 1933 年 9 月 16 日在大阪俱乐部举行的理事会，会上就日印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发布了关于日印会商问题种种协议的声明书。<sup>33)</sup>

除了积极参与联盟的现场活动外，萨海在《会志》中的发文数量也要多于鲍斯。

文章名称	刊号	发行时间
何故ガンヂーは絶食したか、附印度に於ける英国の法規	第一号	1932 年 12 月 10 日
THE ORIENTAL CULTURE LEAGUE	第一号	1932 年 12 月 10 日
PROBLEM OF ASIA	第三号	1933 年 12 月 10 日
印度における仏教の現状	第四号	1934 年 7 月 10 日
満洲国及び比率賓の独立と亜細亜	第六号	1935 年 7 月 20 日
松島大使の講演を聴きて	第七号	1936 年 1 月 20 日
世界平和と東洋文化	第十号	1937 年 5 月 15 日
英国の伝統政策と最近の印度事情	第十三号	1938 年 7 月 25 日
第三国人としての支那事変観	第十四号	1939 年 2 月 1 日
蓄積した東方文化の再放射	第十四号	1939 年 2 月 1 日

注：“THE ORIENTAL CULTURE LEAGUE”（东方文化联盟）和“PROBLEM OF ASIA”（亚细亚的问题）原文为英文，其他文章为日文。

萨海在《会志》第六号上的“满洲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和亚细亚<sup>34)</sup>”一文讨论了亚洲各国的独

33) 《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三号、1933 年、85-86 页。

34) 阿南德·莫罕·萨海“満洲国及び比率賓の独立と亜細亜”（《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六号、1935 年）、43-50 页。

立问题，其中涉及了满洲国、菲律宾和印度。

关于印度独立及英国在亚洲的殖民问题，萨海有如下表述：

印度是亚洲问题的关键之钥。（中略）英国依靠印度的人民和财力对缅甸、中国、阿富汗、埃及和西藏的等地展开侵略。英国现在侵略西藏正是为了保护印度的殖民地。（中略）印度丰富的未开采的资源是大英帝国所垂涎的好饵。如果印度独立，就可以关闭英国入侵西藏的大门，而印度的独立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英国将缅甸从印度分离出去，只是因为其作为入侵西藏的门户，具有很高的价值。（中略）印度如果能够从茶国（英国的蔑称—笔者注）的支配下脱离，那全亚洲的国家都会受益。亚洲的各个独立国家应该联手从充满优越感的英国手中夺回亚洲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永绝东洋的祸根。这正是我们的愿望。

关于印度问题，不仅是他，连内藤湖南也认为是解决亚洲问题的关键。内藤强烈谴责英国依靠文明装置来征服、支配印度的不合理性，用对印度文化先进性的确信来论证印度独立的必然性。并认为如果印度得以独立，那亚洲各国也会望风响应，整个亚洲的独立问题就会得到根本的解决。<sup>35)</sup>

此外联盟一直都很支持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运动，甚至认为应该将满洲国归还给国民政府。<sup>36)</sup>虽然英国入侵西藏和印度独立运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可以破坏英国的入侵行动，无疑可以挫败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气焰，加强印度独立运动的信心。

他在文章的末尾还援引了美国知名人种学家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的文章“有色人种的怒涛”<sup>37)</sup>的节选。

如今亚洲各处都在迎来革命的高潮，殖民政府勉强控制的火焰早晚会产生大爆发，熔岩之雨将落在每一个角落。西洋的酵母是东洋的补药还是致死的毒药？这个前途不明的、革命性的、混沌的怒涛在中国和印度变成了滔天巨浪，将造成极度的破坏和混乱。当东洋的社会制度和醇风良俗遇到强调个人和自由的西洋思想，无视父母的权威、主张两性的平等、蹂躏旧习等西洋思想败坏了东洋的文化。拉姆齐·麦克唐纳（时任英国首相—笔者注）曾就印度

35) 内藤湖南“東方文化聯盟に関する鄙見”（《東方文化聯盟會報》第二号、1933年）、3-8页。此文也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築摩書房、1972年、卷6。

36) 详见清水銀藏“滿支視察婦朝談”（《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五号、1934年）、82-98页。

37) 洛斯罗普·斯托达德著、栗原古城译“有色人種の怒濤”（《日本讀書協會會報》第一百七十六号、1935年）、1-62页。

的半西洋化状态有如下的表述“莫卧儿时代的美丽宫殿装饰着伦敦出产的旧家具，这就是我们给东洋的全部。我们不仅侮辱东洋人的文化、还带着不符合当地气候和风土的物品进入东洋。我们给东洋之心带来了西洋的内容和环境，其结果就是催生唯知识的、道德的无政府主义。”

斯托达德在“有色人种的怒涛”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是西洋在东洋的殖民不得人心，殖民统治迟早会崩坏。形成如此情况的原因是西洋只是单纯地将西洋的外壳和东洋的内核进行匹配，这必然会造成两者的摩擦和对冲。虽然西洋给东洋带来了破坏和混乱，不过其中也有转变的契机。至于融合了西洋文化的东洋会重新焕发生机还是就此消亡没落，则犹未可知。

萨海形容他读完此文后的感受是汗毛倒立，犹如当头棒喝，可见斯托达德的理论对萨海的影响有多大。实际上，斯托达德的理论已经超越了联盟中的清水银藏和鲍斯等人，更接近于内藤湖南的思想。<sup>38)</sup>联盟大多数成员对反殖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单纯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这当然没有错，不过这只是最基础的层面。斯托达德的思想已经超脱了这一层，上升到“吸收了西洋思想的东洋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他肯定亚洲独立运动者为本国和本民族的独立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不过他也将这一“怒涛”称之为“前途未卜的”和“混沌的”，因为独立运动在反殖民统治的同时，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破坏和混乱。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独立运动并不一定能给亚洲带来复兴，唯有找到适合融合了西洋思想的东洋前进的道路，才能够给亚洲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生。

《会志》第十四号上的“积累的东方文化的再放射”<sup>39)</sup>是萨海在联盟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其中提及了他对东方文化联盟未来事业的愿景。

东方文化联盟的事业是一件大事业，是发展东洋的东方文化。（中略）日本汇聚各国的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播到亚洲各国，进而发展出新的亚洲文化。为了这种发展，东方文化联盟必须努力工作。为了亚洲各国，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东方文化联盟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日本国内的氛围，再加上内藤湖

38) 关于内藤湖南的亚洲主义思想及“反西方”的理念，详见陶德民“内藤湖南と東方文化聯盟——昭和初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形態”（《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3、2008年）。陶德民“内藤湖南晚年的东方回归及其含意：从〈新支那论〉到东方文化联盟”（《台北中央研究院“视域交会中的儒学：近代的发展”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2013年）。

39) 阿南德·莫罕·萨海“蓄積した東方文化の再放射”（《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十四号、1939年）、52-53页。

南和清水银藏的接连去世，其思想性已经远不如初创时期那么单纯，开始不可避免地向大亚洲主义靠拢。不过在此大可不必去讨论所谓的“新文化”是何种东西，重要的是可以看出萨海和联盟仍然在坚持国际间的亲善活动，并努力发展东方文化。

今日亚洲人受到压迫而无法获得自由，西洋人掌握着整个亚洲。（中略）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印度受到英国的压迫；法属印度受到法国的压迫；菲律宾受到美国的压迫。东方文化联盟必须纠合亚洲各民族，来解放这种压迫。

可见即便是在联盟活动日趋困难的时候，萨海和联盟也仍然怀有宏伟的愿景，愿意为了亚洲各民族的独立和亚洲主义的实现而奋斗。

萨海相对于鲍斯，他在联盟中的活跃程度要高得多。论参加活动，联盟组织的大部分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若以在《会志》中刊行的文章数量论，他在联盟中仅次于佐多爱彦，比联盟创始人清水银藏还要多。因此可以说他是和联盟中日本成员联系最为紧密的印度成员。

#### 结语

受到鲍斯和萨海等印度成员的影响，联盟组织了不少和印度有关的亲善活动，除了上述1933（昭和8）年2月11日卡尼瓦利在大阪的弓术表演外，还有如：

1933年6月7日，联盟组织阪神地区印度青年4人和大阪外国语学校学生及毕业生8人于大阪茶臼山云水寺举行晚餐会，并将此活动作为日印亲善国民外交的一部分。

1933年7月17日，神户印度协会在平和楼举行晚餐会，旨在促进日印国民交流。联盟出席者有清水银藏、佐多爱彦和户田芳助3人。神户方面的出席者有黑濑市长、榎并商工会议所副会长<sup>40</sup>、足立警察部长、冈见商议书记长4人。此外还有印度青年士绅10余人。

1934（昭和9）年7月25日，恰逢天神祭，为了让泛太平洋佛教青年领略大阪文化的精粹，举办了泛太平洋佛青联合会招待合欢会，并在大阪医科大学医院大讲堂举行了招待会。与会者包括夏威夷、美国、中国、满洲国、暹罗、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和台湾等地的佛教青年70余人。

此类和印度相关的活动不一而足，散见于《会志》的“会务记事”中。

1936（昭和11）年12月联盟成立五周年之际，相继举行了“创立五周年纪念祝贺会”和“创立五周年纪念演讲会”等纪念活动。清水银藏在“创立五周年纪念祝贺会”上作了名为“迎接创立五周年之际”<sup>41</sup>的发言，对联盟成立五年以来的活动业绩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其中涉及印度的有：

40) 此处的榎并商工会议所副会长即榎并充造，《会志》第十七和十八号（1941年）担任联盟理事。

41) 清水银藏“创立五週年を迎ふるに當りて”（《東方文化聯盟會誌》第九号、1937年）、3-7页。



(前略)

### 一、招收外国成员

中华民国三十六人(内含学生二十人)、印度十人、苏联五人、满洲国四人、暹罗一人。主办和参加在京阪神地区关于支那、满洲、印度等地的国际大小会议三十余回,其中涉及印度的有二十余回,涉及支那和满洲的有十余回。

#### 一、关于印度学生等的斡旋

斡旋十五六名印度学生及工作人员来日,亦针对诸多涉及支那人和印度人的事故纠纷进行调停和斡旋。

#### 一、日印通商条约废弃问题

昭和八(1933)年四月,针对此问题发布通告,在之后的理事会上发表了声明书,并在朝日会馆对全体成员公布。之后还举办了演讲会,指导舆论。在此之前的昭和七(1932)年秋冬,提议派遣亲善使节赴印,不过为时已晚,错过了时机,对于通商条约废弃一事深感遗憾。

#### 一、印度震灾义捐

针对昭和九(1934)年春发生的印度震灾,与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印协会和佛教联合会等组织相互协力,募集义捐款项。

(后略)

由清水的总结可知,1931至1936的5年间,联盟在日印亲善上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主办和参加涉外会议三十余次,其中涉及印度的占到三分之二,重视程度可见一般。此外,联盟还在涉印问题上屡屡发声,声援印度的反殖民斗争,对在日印度人也多有照拂。

在“迎接创立五周年之际”的发言中,清水不仅对联盟成立后5年间的事业进行了回顾,也展望了将来。

### 一、阐明东方文化

给予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以发表自己研究的机会。

### 二、交换国民使节

(前略) 尝试所有有益于实现国民国民外交的事情。

### 三、联络东方诸国的文化

扩张本联盟的实体机关,联结同宗旨、同目的的其他团体,并设置必要的支部以促进事业的发展。

#### 四、与东方诸国互派视察团等

提携东方诸国的友谊团体，对互相关于观光、产业、学艺和宗教等方面的视察旅行提供便利，招揽留学生并竭力培养。

#### 五、东方民族内地居住者的保护事业及其他支援

援助与我们有同一思想的外国居留者的事业。

#### 六、通过会志等其他文书扩张联盟的使命

以中英双语对联盟的宗旨和使命进行说明，扩充会志的内容，并刊载更丰富的关于东方各国的资料。

#### 七、与在留东洋诸民族的恳谈会及其他艺术文化的交流

八、将事业逐渐扩展到神户、京都、名古屋和东京等地，借以强化联盟的实力。

(后略)

可见，在成立前五年所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联盟对于将来的发展有相当详细的规划。在清水对联盟未来事业发展的展望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到印度，但所提及的方方面面又和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随着1937（昭和12）年4月20日清水突然去世及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联盟的境遇直转其下，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之前对未来发展的宏愿也成为泡影，当然这是后话了。

东方文化联盟自1931（昭和6）年底成立至1941（昭和16）年活动逐渐式微<sup>42)</sup>，虽然怀有一定的经济目的，但在十年间一直致力于亚洲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为反战和平和反殖民斗争奔走呼吁。特别是在1932-1937年的发展期和鼎盛期，相关活动甚是频繁。虽然按照泷口教授的观点，由于日本国内思潮的变化，联盟的思想在后期已经被迫从早期亚洲主义的和平思想沦为东亚主义思想，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联盟在早中期所从事的各种亚洲主义活动以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鲍斯和萨海为代表的印度独立运动者作为联盟中最为活跃的外国成员，是联盟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联盟思想的界限及亲善活动的多样性。鲍斯和萨海等人对联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为联盟的亚洲主义思想带来了浓厚的反殖民色彩。虽然亚洲主义的目标是抵御欧美对亚洲的入侵，但亚洲主义的主要输出对象是同处东亚的中国和朝鲜，由于东亚三国都没有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因此很多亚洲主义者和亚洲主义团体的反殖民色彩并不是那么地浓烈。而印

42) 东方文化联盟成立于1931年12月10日，解散时间未知。由于《东方文化联盟会志》最后一号（第十九号）发行于1941年10月20日，因此笔者以1941年作为东方文化联盟活动的终止时间。

度从18世纪就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反英斗争更是从未间断。吸收鲍斯和萨海等印度独立运动者加入，无疑为联盟的亚洲主义思想带来了相比于一般亚洲主义团体更加浓厚的反殖民色彩。

二是促进联盟关注人种平等问题。伴随着殖民而来的“白人优越权”问题，一直是近代亚洲的一个痛点。而人种平等问题也是亚洲主义的基础之一，即反对白人在亚洲的优越地位，提倡黄白棕色人种地位、权益平等。鲍斯和萨海等人的反英斗争无疑就是反“白人优越权”，而他们也必将这种思想带到了联盟当中。<sup>43)</sup>

三是促进了更多的亲善活动。除上文提及和印度有关的亲善活动外，实际上萨海还组织了多次日印关系和日印贸易研讨会。如果对《会志》的“会务记事”稍加关注，就会发现联盟所举行的各类活动大部分都和印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单纯从联盟的活动上看，联盟对日印关系的关注度甚至还要高于日中关系，这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团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四是对大阪工商界开拓印度市场提供了助益。联盟组织了大量针对日印贸易的活动，其中基本上都有萨海或是旅日印度实业家的身影。可以确定是，通过东方文化联盟这个平台，大阪工商界可以统合资源，更好地和印度商人进行沟通交流。不过由于暂时缺乏详细的经济数据为佐证，因此联盟为大阪工商界开拓印度市场提供了多大的助益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由于显著的特点，不甚出名的东方文化联盟拥有了相当的研究价值。联盟最特别的一点是着重关注日印关系，这除了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还在于联盟吸收了鲍斯和萨海等印度独立运动人士加入。通过厘清鲍斯和萨海等印度成员在联盟中的活动情况及联盟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关注情况，可以构建出对联盟看重日印关系这一特点的清楚认知，这也是对东方文化联盟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

43) 关于东方文化联盟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关注，详见笔者论文“1930年代日本亚洲主义中的人种平等问题：以关西地区的东方文化联盟为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4号、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21年）、481-492页。